

“選賢治國”：習近平時代的東西方新較量

<http://www.creaders.net> 2012-08-28 20:59:23 多維

近 20 餘年來，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際間意識形態上的鬥爭日益淡化，取而代之的多表現在經濟發展及與之配合的政治體制的比較上。西方一直理直氣壯地將



“民主選舉”作為“普世”的政治體制來推崇，而經濟發展同社會的財富積累被視為證明這種政治體制優秀的標準。但這一切在最近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被視為“專制”的中國，經濟總量在不到 30 年間沖到世界第二位，這令西方國家開始一致向“東”看。特別是在 2008 年經濟危機後，中國的崛起與美歐債務危機形成了強烈對比，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問，中國是如何做到的？如果說這個成功是在一個糟糕透頂的政治制度下取得的，邏輯上說不通。甚至有西方學者提出，“美國存在缺陷的民主制度可以從中國學些什麼”。

其實，所謂的“民主制度”還是“專制制度”，通過選舉擇魁組閣還是一黨制下的“選賢任能”，最終都是以能否找到有賢能、重操守的官吏治理好國家、服務好民眾為目標。人才的競爭，特別是治國人才的競爭已經在當今被認為是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的關鍵。中國早有古語指出：“天下難治，人皆以為民難治也，不知難治者非民也，官也。”中國的飛速發展和崛起，使“G2”的話題在如今越來越被認同，可以設想未來的“G2”競爭，還是東西方較量，選賢治國的問題會日益成為體制討論中的核心問題，而也將是中共在十八大後接任的習近平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一黨制”下的官員效率體制開始被關注

中國的政治體制從被質疑到被廣泛承認，得益於兩點：一是自身發展的成功，成為世界影響力的巨大存在。而且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中國將徹底改變世界政治版圖。二是以美國為發源地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動搖了全球對資本主義體系的信心。而同樣是面臨經濟危機的沖擊，中國經濟總量力壓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中國這種順勢也飛揚、逆勢也飛揚的表現，被視為奇跡。如果說這個成功是在一個糟糕透頂的政治制度下取得的，邏輯上說不通。

從治國角度看，中國的政治制度優勢在於，首先，中共作為執政黨充當了中立的決策者和裁判者，可以制訂國家長遠的發展規劃，並保持政策的穩定性，而不受立場不同、意識形態相異政黨更替的影響。而以美國來說，每一次的“搖擺”都會對國家運行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害，這種由於政黨和領導人的變化而導致經常性的南轅北轍式的 180 度調整，其嚴重後果可以想像。而且，畢竟政黨執政只有 4 年或 8 年，都是在炒短線，誰還管得了以後的事情？西方政黨受任期制的限制，是一種消費心理，並不會去思考給下屆留下點什麼。

中國政治制度優勢的另一大優勢即在於，中共是一個更負責任高效率的政府，對出現的挑戰和機遇能夠做出及時有效的反應，特別是在應對突發災難事件時。最為顯著的一個對比是，2008 年中國汶川遭遇百年一遇的大地震，中共高速有效的動員能力，震撼全球，相較之下，2005 年美國遇到卡特琳娜颶風襲擊，總統小布希是 3 天之後才終止度假，去指揮救災，而此時災區早已成為人間地獄。這雖然只是個案，但西方國家在應對自身突發事件時，往往總表現得相當混亂和低效。

低效率一向被認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為任何一項決策都要經過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並伴隨冗長的程式。

其優點理論上曾被認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誤。然而，從現實層面來看，不僅造成低效率，其最終決策也會由於不同利益集團的相互妥協，造成的負面作用往往成為主導。被民主黨提名為 2004 年美國總統選舉候選人的克里(John Forbes Kerry)曾指出，50 年前一屆國會出現冗長辯論的狀況只有兩次，但現在卻高達 100 多次，讓國會幾乎陷入癱瘓。

“程式民主”未必能產生好領導

原本，西方國家通過選舉擇魁組閣，是為了黨派之間互相監督，互相制約，以求選出最好的領導人，真實地體現民意。然而，現實是，在多黨制下，每個政黨代表的利益群體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眾，或者代表財團。但不管代表誰，沒有一個政黨是全民政黨。此外，造成多黨制無法代表全民的另一個原因是，各政黨通過人為分割社會，形成各自意識形態根據地。像在華盛頓，好像每天都是選舉日，每天

看著兩黨的惡鬥的上演。但是，正是這種做法使得兩黨都無法對民眾有所幫助，更糟的是，這還會使民眾對政府更加不信任。

而且，在實踐層面，選舉本身的很多特徵導致它無法產生有代表性的代表。比如說，美國國會基本沒有工農代表，選出來的結果都是精英；再如，過程非常容易被操縱。如果今天說是“一美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恐怕都不能說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就連西方政客自己也說，在美國民主程序過程中，最大問題是過多的資本驅動。還有，更為精妙的算計策略性投票……政客們深諳此道。

粗糙地說，西方選舉已經形成了一個基本規則：由利益集團和政黨大佬暗箱運作，然後，就是要看能否代表自身利益和是否能夠通過造勢勝出，如宗教信仰、種族、形象、是否會做秀、是否有演講才能、是否有足夠的金錢支持以及政治裙帶等等。選舉原本是為了優勝劣汰，但實際上選民對於候選人，往往是只能聽其言，很難觀其行。

這種注重“程式民主”的特點不在於選了誰，而在於怎樣選。正因如此，所以看到了美國曾選出 8 年治國無方的小布希；會讓深陷招妓、性派對醜聞及腐敗起訴的貝魯斯科尼能夠贏得義大利總理之位……其實，選舉並非民主的唯一形式，全民公決是民主，少數服從多數是民主，尊重少數人意見同樣也是民主，而當把選舉等同於民主，那就陷入了一個重大誤區，如此機械的理解，恐怕就會導致民主流於形式而失去實質。

“選賢任能”更實際 注重連續性

在西方國家，每到選舉季，各方拉票，熱鬧的場面眼花繚亂，這種靠表演秀競選領導人的方式，整個過程仿佛像是看一個巨星是如何誕生的，而不是選出一位能管理國家的優秀領導人。2008 年，當帥氣的奧巴馬以“*Yes, we can change*”征服了大多數選民的時候，沒有人在意他僅僅做過參議員，可以說基本沒有低層經歷和行政經驗，卻被選出來管理整個國家。這在中國是難以想像的。

古代中國有科舉制度，選拔當年國家的最優秀人才，並通過一系列嚴格的遴選、任命制度，為國家選備人才。

以前中國的領導階層是文人儒臣，而現在是中國共產黨。如今，要加入共產黨也並不容易，候選者需要經過被深入調查表現和多年預備期考評。而從入黨，到成為政治人才，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更需要一個漫長的培養過程，也必須要有足夠的基層歷煉。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提出了幹部隊伍建設的“四化”標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指導方針。2002年中共制定了《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建立起了一套規範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制度。清晰地列出選拔任用條件，如工齡、基層工作經歷、學歷等，而後必須經過民主推薦提出考察對象，再經黨組織對包括德、能、勤、績、廉等方面的醞釀考察，集體討論後作出任免決定，並公開選拔、競爭上崗，整個過程須在(監察部門)監督檢查下完成。在之後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進一步將官員選拔過程曝光於“聚光燈”下。整個組織考察過程由“單一評價”走向“大浪淘沙”，避免暗箱操作和一言堂的情況。

更為別具一格的是，中共黨內各級都會定期召開黨組(黨委)會、集中學習、專題研討、專家輔導、座談討論等，甚至政治局常委也會定期舉行集體學習，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原先有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五·七”幹校等，專門用於對幹部進行培訓。目前在中央一級，據悉已形成了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浦東官員學院、井岡山官員學院、延安官員學院以及大連高級經理學院“一校五院”的培訓鏈。

打破意識形態 東西方應更融合

曾被看成威權政體中“唯一現代模式”的甦東共產黨的倒臺一度拉響警鐘。甦共最致命弊病在於：忽視了對自身制度建設，長期執政使執政黨領袖走向個人獨裁和專斷。做不到自身的蛻化，就無法自我調適，進而導致政黨的衰落或終結。中共原本也是一種黨政不分、權責不明、過分集權的體制。“文革”期間的“一元化”領導更是把這種體制推向極端。“文革”後，鄧小平直指“權力過分集中”的“病根”，率先垂範，帶頭破除了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而後，對民主集中制進一步做

出了基本要求——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確定。以最高決策層為例，9 個常委分權制，相當於美國總統的權力被 9 個常委分權，互相制衡，也讓決策顯然更民主和科學。

時至今日，中共已經形成了一個較為成熟的集體領導制度。而且，在自身的演變過程中，打破了意識形態的束縛。像中共黨內民主就是一種派生出的選舉概念。黨員通過行使選舉權，選擇德才兼備、能推進黨的事業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人才。事實上，這即是中共向西方“程式民主”的學習，並進行改良以適用於自身的體制，引入競爭性但仍又要融合、共生。中共以競爭性選舉，改變權力交接關係，致黨內權力結構發生根本性改變，並通過競爭性選舉的錄用、監督、淘汰功能達到“良幣驅逐劣幣”的效果。在中共十六大以後，基層和地方黨內選舉制度創新更是加大了力度，先後創造了“兩票制”、“差額直選”、“公推直選”、“公推公選”、“公推票決”等黨內選舉模式。

判斷政治體制的標準應該是，是否有利於安邦治國，是否有利於維護國家利益、人民利益和經濟發展，而非其他。所以，“一黨制”也好，“民主選舉”也罷，並不是為了誰優于誰，原本用固有的意識形態來看他國的政治制度就已經不得要領。如果要對對方有客觀的認識，就要努力拋棄意識形態所能帶來的偏見。同樣，無論中國還是西方，用已有的意識形態來看待自己的政治制度，盲目相信自己制度的優越性，從長遠看，也會導致制度的衰敗。政治制度並沒有一個終極的目標，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都是根據當時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條件所確立的社會治理體系。當條件變化了，政治制度的表現形式也必須變化。

以法吏治 中共需領導力革命

中國改革開放 30 年，成就有目共睹，但改革的後遺症，使社會財富和權利分配嚴重不公，吏治的腐敗等等社會矛盾也到達了爆發的臨界點。這是下屆中國政府所面臨的最嚴峻考驗。胡錦濤曾指出中共面臨的四大危險：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習近平日前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結業式上作總結講話時也強調“五大優勢”，看似在說“優勢”，但實際上是進一步警醒中共面臨

的風險之意：“精神懈怠”直指“理論優勢”，存在的是信仰迷茫與缺失；“能力不足”直指“組織優勢”，存在的是先進性能否繼續保持的問題；“脫離群眾”直指“密切聯繫群眾優勢”，存在的是幹群關係疏遠甚至對立的問題；“消極腐敗”指向的就更多，顯示了中共面臨的一些優勢被慢慢侵蝕著。

很多人都認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腐敗問題。這也是一廂情願的看法。採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很多國家，如印度、菲律賓、泰國、俄羅斯等等，腐敗程度都比中國嚴重。而且從歷史發展的縱向比較看，所有大國包括美國在內也都經歷過。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Huntington•Samuel•P)曾講過，現代化最快的時候往往就是腐敗增長最快的時候。最重要的原因是財富和資金增長。而監控體系的發展速度跟不上財富的增長，最終可以通過建立更好的監管體制和法治建設，把腐敗降下來。所以，“依法治吏”在當代中國就顯得極為迫切。

中國從來都不乏“吏治”的傳統。在 2,000 餘年的封建社會裡，中國的歷代統治者逐步完善了以科舉為中心的文官錄用制度，和維護王權的法律監督制度；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在建立新中國的過程中，摸索出了幹部的廉政建設制度；近代中共 50 多年來的執政經驗，為依法治吏奠定了很好的基礎。但是，也不可否認，過往的許多“吏治”傳統和經驗，並沒有從根本上擺脫“人治”管理的陰影。“依法治國”的理念現在已經深入人心，但是現實更多的是考慮“依法治民”，而沒有考慮到“依法治吏”，這怎麼可能“依法治國”？

高度中央化的官僚體系，往往無法進行有效的管理，最後就是帶來很多的腐敗。中共在十八大後即將開始一個新的里程，對於接棒的習近平來說，急需在這個問題上厲行改革。這即需要領導在理念上，從權威至上、英雄崇拜向民主法治至上轉變；在領導方式上，由主要靠行政命令，向引導群眾自己在制度框架的規範和約束下從事實踐活動轉變；在社會治理模式上，從“人治”向“法治”演進。從“人治”領導到“法治”領導，這是一場革命性的轉變，涉及理念、領導方式、領導制度、治理模式、法理基礎等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變革。還望在下一個 10 年看到中共能夠取得這場領導力革命的勝利。